

域观范式下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既有“微观—宏观”范式下经济学理论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原因在于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具有显著的域观特征。经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域观现象,中国经济现代化十分突出地发挥了域观效应的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要以域观经济的思维,探索和创造各地区继续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可行道路。

关键词:域观 范式 经济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9)12-0001-04

DOI:10.13891/j.cnki.mer.2019.12.002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影响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两大工业化“奇迹”之一,这两个工业化奇迹,即人类发展的“非常规时期”,分别带动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不是对西方工业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把握复杂域际关系基础上的一种伟大创新。

一、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历史学家相信,任何历史都是可以推论的历史,意思是说,历史不是碎片式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有其“逻辑”的。经济学家更是认为,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可以“推论”的,他们试图以各种基于简单明确的底层逻辑,以严密的推理过程来解释经济现代化的发生和进程。于是形成了各种经济现代化理论。可以说,对“历史”的认知,实际上是基于一定的逻辑建构而想象和诉说的“故事”。

经济现代化是工业化所推动的发展过程,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都始于工业革命,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和不断深化而演进。与工业化前相比,现代经济增长了1500%以上。现代经济增长被称为“史诗般的、非常规的大事件”。经济现代化首先表现为显著快于人类发展长期过程的常规性经济增长,为了认知这一现象,经济学家们力图以各种理论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例如,“节俭论”、“储蓄推动”、“贪欲正当论”、“资本积累”、“地理优势”、“产权激励”、“掠夺”、“大推进”等各种关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动因的理论层出不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观念的力量(例如宗教革命、文艺复兴运动等)改变了世界,或者是制度变革导致了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马克思则认为,是生产力进步决定了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争论:现代经济增长以及制度形成,是理性主导的吗?人类是因为追求经济合理性,才导致了现代经济增长吗?如果突出理性的力量,那么,是谁的理性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呢?

一种认识是,人类的个体是具有理性的,但却并不具备处理大量分散的经济信息的能力,而且,由个人组成的集体也不具有处理大量信息并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的能力,所以,只有依靠具有理性的个人的自发交换行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这一认识的观念根源是不相信集体理性(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集体利益,而关于所谓“集体利益”决策不过是在公共选择中各不同利益主体所达成的妥协),因而不相信社会可以由一个“计划中心”来体现或代表集体理性。总之,关于社会经济的决策归根到底只能是在一定的规则下由个人的自由选择来决定,经济学上说就是由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配置,其中,“市场竞争”机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调节作用。

关于社会经济机理的另一种认识是,不仅相信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的存在,而且相信人类具有理性能力,可以自觉地把握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并做出集中决策,以集体理性避免社会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所导致的矛盾和恶果。这就是社会主义观念以及主张发挥政府作用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根由,即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有组织的力量。

基于对人类理性的认识和关于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解和解释,逐步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这一学术范式假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或私有企业,个人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依据市场价格信号自主决策、自由交易,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所以,只要给微观主体充

分的竞争自由和产权保护,以个人主义行为推动的市场经济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以至发生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当然,除此之外,还假定可以有一个被称为“政府”的宏观决策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和对经济活动的宏观态势进行“调控”。政府具有“唯一性”和决策行为的独断性,这实际上暗含着假定:至少在经济总量关系层面,政府具有或者可以代表集体理性(宏观调控目标)进行相机抉择的决策。基于这样的认识就形成了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成为解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思维框架,通常称为“主流经济学”。

二、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域观现象

尽管经济理论强调理性作用,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但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发展和各国的现实经济现代化的现实过程并不是由“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力量启动,更不是由“宏观”总体的理性行为所启动,而是从某些局部地区(国家)的特殊域境中启动的。无论是从500年前的文艺复兴算起,还是从二百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算起,一直到今天,经济现代化从来都是一种域观现象,即在一定的域境条件下所发生的独特现象,而无法用基于微观—宏观范式的抽象理论来解释。可以看到的事实是,直到20世纪中叶,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基本上是“西方化”,即“西方”域境中发生的“非常规性”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进而不断向相关地区扩展。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和进入现代经济社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所以,在此背景下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力图把西方经济的“域观”现象装进微观—宏观理论范式的盒子之中,而将无法装进这个范式框架中的现象都视为干扰因素或不正常现象而排斥于经济学体系之外,视而不见。这样,就可以断定,西方化是“普适”的,具有“普世”性,甚至认为这就是人类发展唯一的“合理”性。其实,即使是“西方”也并不是一个整体,各国之间并非具有同质性,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更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处于不同国家、地域、领域以及各种可以成为“域”的情景中的不同人群之间的思维和行为差异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人的经济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中发生的,这些制度条件决定或影响人们活动和交往的行为秩序,制度本身并非由纯粹理性所建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因此,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空间总是表现为非匀质的性质。也就是说,复杂的现实经济空间具有“域观”性,即分为具有不同性质或特征的区域、领域或群域,现实的社会经济空间是由无数“经济域”即“商域”所形成的复杂多维空间。总之,工

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从一开始,直到现在,都是“域观”现象和过程。20世纪,经济现代化从西方扩展到东方,先行进入经济现代化过程的一些东方国家都期望从“西化”开始,力图摆脱本国传统的束缚,走上模仿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后来也都各自走上具有各自“特色”的道路。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代化国家。

因而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须以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来替代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进行理论刻画。微观及宏观视角主要体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同质性或共性(假定经济理性的主导),尽可能抽象掉其差异性因素;而域观视角则体现了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的异质性或特性,即注重观察其重要特征和“特色”。前者假定经济空间是匀质性的,而后者则承认经济空间是非匀质性的。无论市场经济的“搅拌机”作用如何强烈,或制度安排及法律规则如何“接轨”,都绝不可能让经济现代化成为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所构想(或假想)的“典型”进程。

因此,当我们考察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就要确认在一般的微观—宏观范式视角下被“抽象掉”但在历史和现实中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的经济角色或因素,即认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域观特征是什么。

三、中国经济现代化及其新阶段

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分流”现象,即整个世界分为“西方”和“其他”(非西方)两大部分。在“大分流”时期,一些西方国家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而西方以外的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处于(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停滞静止状态,成为“落后”“愚昧”的国家地区。“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非西方”,成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百年来,中国奋力改变这个世界大格局,走向现代化。如果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算起,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到今年正好100年。其中,前30年力图向着“西方化”方向推进,虽有一些斩获,但终究不得不承认“此路不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希望走向体现集体理性的计划经济道路,即以国家集中计划的方式,构建推动工业化的特殊商域形态“国营经济”,通过高积累,重点发展重工业,实现经济现代化。走这样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意图通过“大一统”的体制机制,对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进行人为分割(行政化、等级化),以行政性指令方式实施调度和资源配置,采取政治动员方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赶美(国)超英(国)”的现代化雄心。但结果事倍功半,付出极大代价,而未达期望目标。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在思维方式上吸收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范式承诺的思想倾向,如在微观层面通过“放权让利”搞活经济,进行企业改革和公司化构建,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行价格改革,逐步实现由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机制;在宏观层面逐步形成财政金融的货币运行和调控机制,构建了“微观放开”“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格局。但是,在实质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并没有完全遵循“微观—宏观”范式逻辑(如果按此逻辑,理应实行西方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休克疗法”,即实施“断然性”变革),而是从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质出发,实事求是地实行了分域推进的“渐进式”改革开放路径,如采用局部突破、试点推广、梯度推进的方式,稳住一些领域(商域)突破一些领域(商域)的改革路径。从微观—宏观范式逻辑看,这样的改革道路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因为制度上的“双轨”差异必然会引起各种矛盾、冲突和混乱,但中国改革开放却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功。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十分突出地发挥了域观效应在推进经济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成效显著,为世界所公认。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经济体,具有极为复杂的域观结构,地区间、城乡间、产业间、行业间、部门间乃至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均存在不同的域观差异,通

常所说的“中国特色”,不仅是指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而且是指中国内部的巨大域观结构以及差异性和非匀质性。在这样的客观现实条件下,即使完全放开市场,也很难发挥市场竞争“搅拌机”的功能,顺利实现经济体内的匀质化。因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不同域类的经济空间中采取了不同改革进度和开放进度,渐进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成效,彻底改变了50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分流”态势。经济史研究者称“这是世界史上最为成功的发展故事”。

20世纪90年代,世界总人口中的43%即近20亿人,处于世界银行划定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到2015年,全球人口增长了20亿,极度贫困人口却减少到9亿,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人类总人口增长,贫困人口的数量却下降的状况。其中,中国经济发展让人们的平均收入增长了20倍,5亿多人口脱贫。1978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22倍,到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608美元,美国人均GDP为62606美元,约为中国的6.5倍,两国间差距显著收窄。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85.1%(见表1)。当前,中国人均GDP正在步入跨越世界人均GDP平均水平的关键点,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入新时代。

表1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变化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①
世界人均GDP(美元)	2516	4268	5484	7271	9514	10172	10201	10714	11296
中国人均GDP(美元)	194	317	959	1753	4561	8069	8117	8827	9608
中国位次	143	159	133	128	109	83	78	73	67
中国人均GDP/世界人均GDP(%)	7.7	7.4	17.5	24.1	47.9	79.3	79.6	82.4	85.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四、以创造性思维迈进经济现代化新征程

尽管同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按GDP总量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前所述,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域观现象,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特征有较大差距。东部沿海与中西部之间、南北方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类区域之间,各具域观特征,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实行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地区产生的效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进入新时代,各地

区的经济发展,更要以域观经济的思维,探索和创造各地区继续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可行道路。据统计,2017年苏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5万元,按汇率折算超过2.2万美元,即已达到世界人均GDP水平的两倍以上,无疑已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中国较高收入地区如何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现代化新征程的探索,就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性实践。

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现代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模仿性和跟随追赶性,前有“标杆”国家可以作为对照和追赶对象,只要奋力,光明在前。而对于今天的中国

^① 2018年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已经没有了模仿对象和标杆国家。正如任正非先生所说的,我们进入了“无人区”,没有前车之鉴,前面的道路需要靠我们自己探寻。

从域观范式的思维来看,世界现代化的未来,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差异化格局和“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态。我们必须超越发展阶段论的线性思维,即认为现代化只是一个从落后到发达的过程,国家(地区)间的经济现象差别都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的缘故,所以只要达到了经济发达阶段,各国(地区)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特征就都会趋同。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最多不过是具体发展道路的不同,而发达阶段的目标状态必然相同,制度也将趋同。其实,现实世界各国(地区)的现代化并非这样的线性发展轨迹,其发达或成熟状态更不会完全趋同。也就是说,各国(地区)社会经济的差异性未必都是发展阶段不同的缘故,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的域观特征所导致。现代化的阶段性推进并非是线性过程。例如,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香港地区也可以算是一个发达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了,而中国大陆还处于不很发达和不够成熟的发展阶段,那么,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大陆经济更发达更成熟后,其现代化前景会像香港的状况趋同吗?更难以设想的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有可能变得像美国经济那样吗?可见,现代化绝不是向着一个唯一“理想状态”发展的过程,难以有“殊途同归”的未来,各国(地区)之间的域观差异永远会存在,具有不同域观特征的经济体(国家)的共存,才是世界现代化的真实前景。

如果从发展阶段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升级”视角来看,当前世界正面临一个现实挑战:从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看,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工业化现象,迄今为止,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而当率先工业化的国家,达到了高收入的经济发达阶段后,发生了“去工业化”现象,经济增长率也显著下降。人们曾经满怀信心地认为并宣称,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就可以使世界摆脱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再次走上强劲增长的经济增长路径。但是,事实并非这样。从美国奥巴马政府宣称“新经济时代”以来仅仅 20 多年,世界反而发生了三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见,对于如何以高技术产业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摆脱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停滞静止状态”,人们尚缺乏深刻认识。人们仍然很困惑:高技术产业为什么也会让社会失去信心,导致“泡沫”膨胀后的崩盘和经济危机?为什么在所谓“高技术”“新经济”时代,传统产业(例如房地产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高技术产业反倒要依赖“高杠杆”来支撑?

人们虽然可以相信,高技术产业具有巨大增长潜力,但为什么并没有看到强劲的经济增长?产业确实是向高端升级了,但为什么经济增长率却一步步“下台阶”?这可以仅仅用“转型”来解释吗?那么,“转型”“升级”完成后,经济增长表现将会是怎样呢?一些欧美学者开始认识到,服务业难以取代制造业而推动强劲的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施再工业化对策。当前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表现出这样的强烈政策意向。同时人们还认定,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可以给经济发展输入新动能,是经济增长的希望所在。不过,这一预言还需要用现代化的实践来实现和证明。人们相信,经济现代化的深度推进,特别是智慧产业、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实际上是承认或预见:现代化的未来,人类将在新的域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因而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必须与之相适应,现代化的形态也将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也是可行道路,那么,以创造性思维迈进经济现代化新征程,发挥创新的力量,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五、结 语

现代化新目标的实现,要有新理念和新实践。中国现代化正处于继往开来的历史关键时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中国未曾走过的路程,面临许多挑战,需要继续发挥域观思维方式所驱动的改革实践精神,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进行更具前瞻性的创新探索,向着持续发展、全面协调、清洁高质、开放包容、善治为民的大目标,实现包容性经济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总之,中国现代化走在新的探索之路上,现代化没有相同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显著域观特征。

参考文献:

1. 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2. 金碚:《中国经济70年发展新观察》,《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
3. 金碚:《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区域态势》,《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学会会长(北京 100732),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郑州 450001)。

[责任编辑:张震]